



钱基博著作集

德国兵家克劳山维兹 兵法精义

钱基博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16
2012/1

閱 覽

钱 基 博 著 作 集

德国兵家克劳山维兹 兵法精义

钱基博 著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德国兵家克劳山维兹兵法精义/钱基博著.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4

(钱基博著作集)

ISBN 978-7-5325-6207-7

I. ①德… II. ①钱… III. ①克劳山维兹, K.V.—战
争理论—研究 IV. ①E095.1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04419号

钱基博著作集

德国兵家克劳山维兹兵法精义

钱基博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邮政编码200020)

(1)网址: www.guji.com.cn

(2)E-mail: guji1@guji.com.cn

(3)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3 插页 2 字数 80,000

2012年4月第1版 2012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300

ISBN 978-7-5325-6207-7

K · 1482 定价: 10.00元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出版说明

钱基博(1887—1957),字子泉,别号潜庐,江苏无锡人,著名学者、教育家。

钱氏出身书香门第,四岁起即读《四书五经》,十五岁时读《资治通鉴》、《续通鉴》、《读史方輿纪要》等书。少年时期所受的教育,决定了他一生的学术走向。钱氏在思想上基本上秉持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根本理路,以中国传统的经史之学为自撰门径,同时亦以此为驾驭新知识、新学问的一种方法。

辛亥革命兴,钱氏曾在军政府中任职,但其一生的事业主要还是在于教育。钱氏自十九岁始任家庭教师,二十六岁任无锡第一小学教员,二十九岁任吴江丽则女子中学教员,此后更历任上海圣约翰大学国文教授、上海光华大学教授、国立浙江大学教授、湖南国立师范学院教授、国文系主任等职,直至最后以华中师范学院教职工的身份去世,钱氏一生可说是与教育结下了不解之缘。这种教育者的身份,使得钱氏在秉持和改造传统学术理念的同时,又十分注意传统学问的传播和普及。从三十多岁时出版的《语体文范》到四十多岁时出版的《国学文选类纂》、《老子道德经解题及其读法》等一系列著作,钱氏在学术上的所作所为均有推广和规范传统学问的意旨。在研究传统学问的同时,又力图使其成为普通知识人的日常所需,这构成了钱氏治学的另一特色,而这种特色又反过来使得钱氏的著作成了普通读者迈进国学门槛的绝佳指引。

钱氏一生著述甚多,《国学必读》、《经学通志》、《古籍举要》、《中国文学史》、《孙子章句训义》、《文心雕龙校读记》、《读庄子天下篇疏

记》、《四书解题及其读法》、《周易解题及其读法》等均可看作其在学术上的代表作品。此次所出版的《钱基博著作集》，以收录钱氏有代表性的单行著作为主，同时选收具有学术意义的代表性论文。其中《周易解题及其读法》、《四书解题及其读法》、《老子道德经解题及其读法》、《文史通义解题及其读法》、《古文辞类纂解题及其读法》五种合为一编，名为《国学要籍解题及其读法》。诸书所用底本，皆经精心选择。为适应现代阅读习惯，均改以简体横排，同时对原书所用的不符合现代习惯的标点符号进行了处理。对于原来存在较大问题的书，如《文心雕龙校读记》，由于原书夹注中并无点断，几至无法阅读，则重新进行了校点。诸书中所引的重要引文均进行了核校，除去一些明显的错字、古今字、繁简字径改之外，对原书文字的改动均用页下注的形式标明，以存原貌。对于那些可能引起误解的繁简字、异体字等，则不行简化，皆保持原样。钱氏的著作是普通读者学习国学很好的入门途径，相信我们的工作将会对广大读者大有裨益。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年5月

目次

卷头语	1
发凡第一 原著卷一《论战之性质》	5
明学第二 原著卷二《论战之原理》	27
战略第三 原著卷三《论战略》	59

卷 头 语^{*}

侯官严又陵先生有言：

西方一德，东方一倭，皆犹吾古秦，知有权利而不知有礼义公理者也！德有三四兵家，且借天演之言，谓战为人类进化不可少之作用。德人虽有议院，然实尚武而专制，以战为不可少之圣药；外交则尚夸诈，重间谍；其教民以能刻苦、重竞争为本；其所厉行，乃尽吾国申、商、孙、吴之长而去其短。日本窃其绪余，遂能于三十年之中，超为一等强国。（见《学衡杂志》载《与熊纯如手札》）

何图狡焉启疆，肆毒于我，喋血千里，乘胜远斗，其锋不可当；顾究其所以用兵行军之法，壹以德为师资。而百年以来，德之名将所奉行之战略，皆出其军学鼻祖克劳山维兹氏而自为神明变化。克氏则普法之战常胜将军毛奇之师也。孙子曰：“知彼知己，百战百胜。”倘知克之所以言兵，则知我之所以制日；胜负之数，其如示诸掌乎！

克劳山维兹氏，以西历一七八〇年生于普鲁士之马特堡。其先本波兰人也。少小有胆智，束发从戎，至十三岁而与于抗法之战焉。二十一岁，入柏林军事学校，校长香化斯脱氏深器之，而以二十三岁卒业。至二十六岁，为一八〇六年，法皇拿破仑以大军来侵。普人御之，败绩，而克氏为俘焉。既而普与法媾和，交释所俘，遂以一八〇九年归普，参赞军政之改制，实施征兵，用奠普国复兴之基。而卒以普

^{*} 据江南出版合作社 1941 年版校印。

为城下之盟，低首下心，惟拿破仑马首是瞻也。义有不屈，私计当日地广兵强之未为法屈者，惟有俄尔，乃走俄军，为参谋。及拿破仑纠诸国联军以伐俄，而普军与焉。俄为坚壁清野；而拿破仑老师深入，无所得食，军以大溃，僵殍属路。然而普人震于积威，莫之敢撓！于是克氏发愤而起曰：“报仇雪耻，在此举矣！时哉不可失也！”身入普军，慷慨陈辞，上说下教，莫不为之动容。于是普人发难，乃举兵以声讨拿破仑；任白立希氏为元帅，而克氏为之参谋，以有一八一四年滑铁卢之役。而于是百战百胜之拿破仑一蹶不振，遂以降王受繫；则克氏之以也！既以知兵有闻于普，而为军官学校教官，普王太子军事教官。至一八一八年，受命为柏林陆军大学校长，而毛奇将军实隶籍为弟子焉。以一八三一年十一月十六日卒，年五十二岁。

克氏之卒也，其夫人玛利校订遗著，以一八三二年六月三十日出版，而为之序焉；凡十册，而冠以兵法三册，分八卷。其中一论战之性质，为八章；二论战之原理，为六章；三论战略，十八章；四论交战，十四章；五论兵力，十八章；六论守，三十章；七论攻，二十一章；八论军事，九章；共一百二十四章，原始要终，富哉言乎！自毛奇以暨欧洲大战之兴登堡、麦耿生、鲁登道夫诸大将，莫不奉为绳墨，善其运用。而夷考克氏之言兵，传授心法，乃得之拿破仑大皇，以其习与拿破仑战者久也。当其时名王大将之遇拿破仑者何限，日与为构，徒惊拿皇用兵之神，纵横挥斥，莫测高深，只有目眩心骇，望风而靡已耳！独克氏运其机智，好学深思，窥拿皇用心所在，默识心通以能自得师，成一家言；所以其言兵不墨守成法，而焯有玄解，蔚为德国兵学之祖也！其大指可得而论者有三：一曰战争之道，尤贵迅速决胜，而以消溃敌国之军队及其战斗力；孙子所谓“贵胜不贵久”，而“古之善用兵者，能使敌人前后不相及，众寡不相待，贵贱不相救，上下不相收，卒离而不集，兵合而不齐”，用此道也。二曰战略无妨政略，外交以辅军事，斯其战胜不忒。如恃胜好战，而外交因应无方，则未有能终保其胜！孙子所谓“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预交”；而“霸王之兵，伐大国，则其众

不得聚；威加于敌，则其交不得合；是故不争天下之交，不养天下之权，信己之私，威加于敌，故其城可拔，其国可堕”者也。三曰操纵敌国之舆论，以煽诱敌国之心，使之厌战而自为瓦解。夫如是，其孰能御我！此则马谡应诸葛亮南征之对，所谓“用兵之道，攻心为上”，而出以新式运用者也。而今观于日本则何如？方其始也，挟战胜之威，乘积弛之我，欲以雷霆万钧，迅雷不及掩耳，胁我媾和，解我军备，然后因我之资，蓄力养锐以徐与俄持；故其大命悬于速战而大捷，信有如克氏所论者！然而孟贲、乌获，力有所底；鼙发雷奋，浸淫以迄今日，老师深入，兵顿鲁南。我方再接再厉，敌已再衰三竭。岂非孙子所谓“其用战也，胜久则顿兵挫锐，攻城则力屈，久暴师则国用不足。夫顿兵挫锐，屈力殫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耶！此其无胜我之道一矣！日之有疾怨深仇于俄，非一日矣；而又以好大喜功，招英法之怒，协以助我；而亦自虑专欲之难成也，乃与德、意为构。德、意虚以协定相饵，而阴以邀利于英，大欲一偿，何借于日！而方穷兵不戢，以来逞志于我。此正孙子所谓“不争天下之交，不养天下之权，信己之私，威加于敌，故其城可拔，其国可堕”，危乎殆哉！抑亦克氏之所致戒也！其无胜我之道二矣！师直为壮，曲为老。凡我国人，外御其侮，小大毕力，未有贰志。而日则残民以逞，师出无名，诽谤有诛，道路以目，兵无斗志，军纪日壤；而贪财好色，淫掠无禁，贼杀不辜，益以坚我国人同仇敌忾之志，有死而无二。虽欲如克氏所称“操纵我国之舆论”，消杀国人之抗战而有所不能。何者？则以日军之恣为不道，我国之人怀必死，而非可以虚词饰说动焉！此其无胜我之道三矣！观于克氏之为书，而胜负之数，不待著蔡，昭然可睹也，要在我之有以善图其后耳！其书以一八四九年，有法译本；一八七三年，有英译本。

基博尝授同学诸子以孙武书。时则首都沦陷，我军败绩；天下汹汹，士无靖志！而基博则谓：“强弱无定形，胜负无常势；要在量敌而审己，因利以制权。倘得孙武十三篇书读之，心知其意，可以镇方扰

之人心，延国命于垂绝！”亦以为乡人顾君谷宜诵说。谷宜闻而惊叹曰：“微乎微乎！出神入化矣！惜余闻道之晚也！”既而昭于基博曰：“余粗习欧故。”迺为道：“德之有克氏焉，言而世为天下则，亦庶几欧西之孙子也！”迺据英译本以相研讨，而证孙武之书。虽其言有合有不合，而要以证见日所以敢冒天下之不韪而以逞志于我者，其道有由！基博曰：“盍迻译以为我国人告也？”谷宜笑曰：“孙武书十三篇耳，然而国人罕有肄业及之者！况克氏之下笔不自休，其卷帙之浩浩，且什伯于孙武书焉，恐读者未终卷而我倦欲眠矣。宁易窥其要领所在乎！”基博仰而思，俯而答曰：“是何伤！请毋斤斤于字比句次之直译，而会通其旨以为要删。意最其精，辞出以达，庶几目治者易终卷，心维者易挈要焉，其亦可也！”于是谷宜说其义，基博润其辞，以一卷为一篇，随篇标目，题曰精义，勿以辞阙。挂一漏万，虽自知其未允；提要钩玄，庶无负于作者！如以此为未足，则有克氏之原书在。聊疏其旨，以冠于篇。时在中华民国二十七年之五九国耻纪念日，无锡钱基博叙于国立浙江大学之江西泰和县上田村舍。

发 凡 第 一

原著卷一《论战之性质》

克劳山维兹曰：欲论兵，不可不知战。而战之为道，暴行也；乃以威力加于敌，胁之以受命于我，而惟我之所欲为。此战之所为起也，论者不察，乃倡议裁减军备，不以杀敌致果为武。此在人群为仁义，而以论战则罪恶！何者？天下之为危道，莫大乎论战而不非仁义矣！夫仁者不杀人，义者不侵人，而战则驱不义之徒，操杀人之器。如不以杀敌致果为武，而以刑仁讲义为尚，可杀之人不杀，可侵之国不侵，则何以兼弱攻昧而威加于敌哉！又不仅是。我不杀人，不能禁人之不杀我。我不侵人，安能止人之不侵我！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拱手揖让以听人之宰割，危莫大焉，辱莫大焉！所以仁义与战，两不相容之道也！而言战必舍仁义。战之为道，暴行也；惟暴为无敌。仁义之师，鲜不挫败。然仁义不能以用兵，而理智则无害于暴。战者，利用理智以肆于为暴，而尽力之所能焉；倘以与不能为暴，刑仁讲让之敌遇，有不战，战必胜矣！战之所欲者，理智之暴行也；非仁也，义也！世日趋于文明，而两国交兵，优待俘虏，不残破不设防之城市；岂果以煦煦为仁、孑孑为义哉？诚以战之威力所加，有大于此者耳。或者乃以为野蛮。不知杀人之器，随科学以俱新；而国之文明愈高，战之危险愈大，人民同仇敌忾之心亦愈烈。何德不报，除恶务尽，不恤冒天下之不韪以快意于一战。文明之与野蛮何殊焉！

基博按：此克氏开宗明义以诂战之第一义谛；而何其言之酷烈也！其在我国：周穆王时，有徐偃王，地方五百里，行仁义，朝之者三

十六国。而穆王方骋八骏以西巡狩，闻诸侯咸归于徐，一日千里，长驱而归，使楚人伐徐。偃王不忍斗其民，北走彭城，百姓从之者以万数。偃王将死，曰：“吾赖于文德而不明武备，故至此！”又春秋之世，宋公及楚人战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济。司马子鱼请击之。公曰：“不可！”既济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陈而后击之。宋师败绩，公伤股。国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子鱼曰：“君未知战！勍敌之人，隘而不列，天赞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且今之勍者，皆吾敌也。虽及胡者，获则取之，何有于二毛！明耻教战，求杀敌也。伤未及死，如何勿重！若哀重伤，则如勿伤！哀其二毛，则如服焉！三军以利用也，金鼓以声气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声盛致志，鼓儻可也。”此则仁义之师，鲜不挫败，克氏之言，若信而有征也！然而我国先圣昔贤，曾不以徐偃、宋襄为大戒，而论兵不废仁义。孟子之言曰：

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孟子·公孙丑》下）

有人曰“我善为陈，我善为战”，大罪也。国君好仁，天下无敌焉。南面而征，北狄怨；东面而征，西夷怨，曰：“奚为后我！”武王之伐殷也，革车三百两，虎贲三千人。王曰：“无畏！宁尔也，非敌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征之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战！（《孟子·尽心》下）

荀子议兵，常以仁义为本，曰：

仁者爱人，爱人，故恶人之害之也；义者循理，循理，故恶人之乱之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争夺也。故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过者化，若时雨之降，莫不悦喜。且夫暴国之君，将

谁与至哉？彼其所与至者，必其民也；而其民之亲我，欢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兰。彼反顾其上，则若灼黥，若仇雠。人之情虽桀、跖，岂肯为其所恶、贼其所好者哉？是犹使人之子孙自贼其父母也！（《荀子·议兵篇》）

则是克氏唯暴为无敌，而孟子言仁者无敌；克氏论兵以暴行为主，而《荀子·议兵》以仁义为本。然此犹儒者之论，则见以为迂阔而远于事情；而孙子则兵家之祖，亦以“不战而屈人之兵”为说。其言曰：

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孙子·谋攻篇》）

杜佑为之解曰：

敌国来服为上，以兵击破为次。

张预更引伸之曰：

《尉繚子》曰：“讲武料敌，使敌气失而师散，虽形全而不为之用，此道胜也。破军杀将，乘堙发机，会众夺地，此力胜也。”然则所谓道胜、力胜者，即全国、破国之谓也。夫吊民伐罪，全胜为上。为不得已而至于破，则其次也。不战，则士不伤；不攻，则力不屈；不久，则财不费。以完全立胜于天下，故无顿兵血刃之害，而有国富兵强之利。

诸葛亮征南中，问计参军马谡。谡曰：

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愿公服其心而已。（《三国志·马良传》注）

此则我先圣昔贤论兵之第一义谛，与克氏为异。盖克氏欲肆为威暴以消敌人抗战之力。而我先圣昔贤，则强行仁义以消敌人抗战之心。此则全国、破国之异趣，心战、兵战之殊途，其大较然也。远古姑不论；而近代之战，尽有敌国政府抗战之力，已臻摧毁；而敌国人民同仇之心，益以坚强！即以德而论，观其以一九一四年发滔天之难，所向无前，攻比攻法，尽力摧毁，岂非肆为威暴，欲以力求贯彻克氏之所论哉！然而负固不服，既出法比人民同仇之心，而其政府抗战之力，亦不容不以再接再厉。卒之顿兵挫锐，无救于挠败者，岂不以敌国抗战之力，未易以威暴消之使尽，而其人民同仇之心，乃益以威暴奋其武怒哉！然后知孟子言“仁者无敌”，孙子之“必以全争于天下”，为老谋深算；而克氏所论之未为究竟义也！

战之为道，暴行也。而所以为战者有三：其一摧毁敌国之战斗力，使之不能复战。次则占领敌国之土地，使之无法复兴以整军经武。又其次则消散敌国人民之战斗意志，而煽其人之爱好和平者起而反战。国之所与存亡废兴者，人民也。民心泮涣，人无斗志，彼其政府，将谁与战！夺其所恃，自不得不惟我之命是听。而我之威加于敌，所以耗其国力者，尤必大于我之所求欲，而予敌人以永劫不复之残破。屈服愈迟，则残破愈大。苟非屈服，无以自救，于是敌人乃不得不忍受我之所欲求，低首下心以保苟延之一息，以免加深之残破。始以我之所求为大欲者，今以与我威力所及之残破相较，乃转觉其渺小；然后知我向所求欲以为宽大，而自悔其未早计。两害相形，必取于轻；事有必至，理无可疑者。然非光毁其武力以尽消溃敌国之军队，不克臻此。夫先人有夺人之心，若我不先毁敌之武力，则敌或毁我之武力。我之武力毁，则我将惟敌之命是听，事久变生，未可知也。是故战之第一事，必先摧毁敌国之战斗力，而尤不可不尽摧毁之，使之不能复战。然而事未可以一概论！

其一，欲尽摧毁敌国之战斗力，则我之武力，亦必尽量发挥；我之

军费，亦必尽量支出。而以视战胜后所偿之欲求，未必与消耗相当，则是功不补患，得不偿失！不如占据其土地，抚定其人民，因资力以为持久之计，据形胜以示控制之势，绝其与国之援，阻其运输之路，形格势禁，敌自破败。以视摧毁敌国之战斗力，而势不得不出于苦战者，劳费较少，收功为易。

其二，欲尽摧毁敌国之战斗力，必集中我国之武力、物力，尽其所以恣一战。胜负固非一战所能决，而第一战胜负之所系于士气之勇怯、民心之得丧者甚大，何可不以全力出之！而欲倾国之所有以事一战，非人民同仇不可。人民安居乐业之既久，谁则好战？而敌忾之心，往往非一鼓所能作，而抚有广土众民之大国，其人力物力，亦非旦夕所能集中。此尤摧毁敌国之战斗力，欲先而不易为先之一端也。

其三，欲尽摧毁敌国之战斗力，必挑敌与战。如敌不以战而以守，则我之术有时而穷。何者？近世战术，利守不利攻；而兵力之弱者，常以守而延长战争。旷日持久，而攻者困于士兵死丧之过多，财用支給之日匮，情见势绌，则不战而自屈。昔在普鲁士佛立德力大王之七年战争（1756—1763）时，其兵力不如奥之众且强；而奥无以制其命者，徒以守而不与战也。虽然，所谓守者，非坐困之谓也，特静以观变，相机而动以待反攻之机会耳。如有反攻之机，则必迅速以赴敌。苟攻守不相为用，守者每不知敌之所为攻，何得不分兵四防；而攻则可集中兵力以专注一处。以四散之分守，而当集中之猛攻，夫如是，其孰能御之！

基博按：一九一四年欧洲大战，英、法、美三国联军总司令福煦将军，尝在巴黎军官大学演说，谓：“自来名将，每先取守势，一俟敌军疲惫，大举反攻。以我之怠，乘敌之衰，未有不胜。”其说盖本克氏，而用以搏西战场最后之胜利。其在我国：广昌揭喧著有《兵法百言》一书，历观古今兵事利钝之故而籀其会通，其中有“延”与“速”之两言，而相次以明为用，以为：

势有不可即战者，在能用延。敌锋甚锐，少俟其怠；敌来甚众，少俟其解；征调未至，必待其集；新附未协，必待其孚；计谋未定，必待其决。时未可战，姑勿战。盖拙者贵于守；延者，势在必战而特迟之也。势已成，机已至，人已集，而又迁移迟缓者，此堕军也。士将怠，时将不利，国将困，拥兵境上而不决战者，此迷军也。有智而迟，人将先计；见而不决，人将先发；发而不敏，人将先收。难得者时，易失者机，速哉！用兵能速，则智不能谋，勇不及断，已舒而人促，已裕而人窘。

盖始之以“延”，胜之于“速”，其论亦与克氏之指相发。欧洲大战，法国福煦将军之所以挫德者以此；而我今日之所以图制日者，亦无出于此。观法之能胜德，知我之必胜日矣。特是日人知其士之将怠，时之将不利，国之将困，不甘为揭氏之所谓“迷军”，而欲快心于一决。此诚揭氏所谓“敌锋甚锐，少俟其怠；敌来甚众，少俟其解”。在我则用“延”，而尚未臻用“速”之日也。揭暄字子宣，清初人，见阮元《畴人传》。称其深明西算，而又别有悟入，其言七政小轮旋转而生漩涡，遂成留逆，实为古今之所未发。所著《璇玑遗述》，一名《写天新语》。

其四，战之成功，非绝对也。胜败，何常之有！败者岂无旂鼓重振之日！而邻国之环以伺我，眈眈逐逐者，正大有人，何可不虞！如我武力、物力，倾国之所有以耗之于一国，尽之于一朝，而不图有以善其后，必有承我之敝以牧功于全胜者。夫患生于不防，虑及于可知。天下事，往往有谋之于数年、败之于一旦者。是以人生多意外之变，世道有不虑之衅，而战为尤甚者也。知彼知己，何尝不审！而军事情报，每多失实。其在兵法，用间固为尤难。强弱之故，难以臆测。是故战，危道也，匪不得已，不可以战。而及其战，人民不可不有敌忾之同情，将帅不可不有缜密之战略，国家不可不有久大之政略。而其运用，则因时而异，因地而异。夫纵横捭阖，国际间之政争，永无已时；而战则国际政争之一法，不过以弥缝其阙耳。是故为将帅者，不可以

不明政治；而政略，则战略之所自出焉。

基博按：日人之所以施于我者，消溃我军队，占据我土地，摧挫我民气。凡克氏之所指画，几无不倾囊以出；而尤殚锐竭力以欲消溃我军队，可谓传授心法！虽然，孙武不云乎：

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孙子·九变篇》）

克氏历陈消溃敌军之为先务之急，而卒之曰：“事未可以一概论。”长虑却顾，言其可，而亦何尝不虑其事之不终可耶！此其“杂于利害”之所以为智者。而日人则一意孤行，见其可而不见其不可，尚为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至于克氏所云“消散敌国人民之战斗意志”，似与我先哲攻心之论有合。特我之所谓“攻心”者，盖以德服人之仁；而克氏所云，则半出于力征，半出于计煽，惨徼狙诈，殆兼而有之。我以仁，彼以暴，未可以同年而语也！

战之胜负，将之才不才系焉；而人才不易，将才尤难。国家日进于文明，百度维新，然人才只有此数，则以社会相需之殷，而将才少。惟野蛮之国，事业不振，人才无所用之，而又日竞于武，故将才多。特是才有高下，将有智愚；而才之高者，所贵有明敏之睿智。睿智，则必随文明以俱进。惟文明之国，厥为名将之所孕毓焉。苟其国家文明，其人民好战，则其国之名将必多。远鉴古之罗马，近观拿破仑时代之法，名将蔚起，莫之与京，岂偶然哉！无亦以好战之人民，而擅有文明之国家，故能钟灵秀以有此盛也！

将以智为本，以勇辅之。而勇之为验有二：一曰临大危而不挫其气；一曰常大任而不避其艰。一言以蔽之，曰不畏艰险而已。夫不畏艰险，或起于轻生之习性，或激于爱国之热情。轻生则气锐，情热则多力；而意气陵厉，自无畏难苟安之心矣！